

“民族問題”再議： 馬克思主義與其超越

莊雅仲

雲林科技大學文化資產維護學系

摘要 這篇文章將從一個困難的對話開始，亦即馬克思主義和民族主義之間的理論糾纏，這篇文章重新檢視這個馬克思主義者爭辯多時的“民族問題”，尤其是盧森堡和列寧之間的辯論。這一個馬克思主義遺產提供一個起點，讓我們重新反省民族的意義，尤其在現今這一個變動的全球資本主義體系中。這一個辯論一方面顯示出馬克思主義者在處理民族主義與民族意識時的洞見，一方面也暴露出馬克思主義無力應付一個新的全球差異政治的窘境，華勒斯坦曾坦白地指出這一個理論困境。安德森、蓋爾納和巴巴等民族主義和後殖民理論者，努力探詢這一個新的差異和認同政治與全球或國家權力消長間的關係，我發現這些新理論提供不同的方式看待民族、國家與全球經濟問題，不過某種程度仍陷於早期馬克思主義者的泥淖中。最後，我從殖民理論者法農的文字裡，發現重建一個民族理論的契機。

這篇文章將從一個困難的對話開始，亦即馬克思主義和民族主義之間剪不斷理還亂的世紀糾纏，馬克思之後的許多理論或行動者像羅莎·盧森堡（Rosa Luxemburg）、列寧（Lenin）、史達林（Stalin）以及第二國際的其他理論家以不同方式介入這個辯論。瞭解馬克思對民族文化和非資本主義生產模式的模糊立場，這些馬克思主義者試著理論化正發生於歐洲與世界其他地方的一個新情況，這個新情況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將世界連結起來，包



括越來越全球化的資本主義與變動的國家界線問題。他們不僅辯論資本主義的未來，同時也思考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如何在這一個新結構中，進步地介入並促成一個國際革命。在這些爭辯中出現了一個理論與實際的緊張，亦即國際主義的理想如何和民族自決的要求並存，民族國家界線與文化差異首次在馬克思主義的世界無產階級聯盟中佔有一個雖具爭議性但重要的地位。

本文將重新檢視這個馬克思主義者爭辯多時的“民族問題”，尤其是盧森堡和列寧之間的辯論。這一個馬克思主義遺產提供一個起點，讓我們重新反省民族的意義，尤其在現今這一個變動的全球資本主義體系中。處理這個有關民族主義的歷史發展問題，基本上我接受哈布斯邦 (E. J. Hobsbawm) 的看法，許多馬克思主義者對這個問題的爭論，已經預期了民族主義理論後來的一些革命性的發展，包括不將民族 (nation) 視為是古老的遺產，而是現代的產物，民族不具有內在的本質，而是民族主義運動中的創造。¹ 透視民族主義作為一個試圖將領土、國家與民族合而為一（也就是民族國家）的政治與文化運動，使得回答“甚麼是民族”這個問題，必須回到民族主義的歷史過程中尋求解答，也就是哈布斯邦說的：真正民族是甚麼只能從經驗中 (*a posteriori*) 追溯瞭解。這當然也問題化了民族文化 (作為特殊的傳統遺留) 以及民族意識 (蘊含理性與感情的綜合) 等等久被視為理所當然的概念。²

雖然這一個辯論顯示出馬克思主義者在處理民族主義與民族意識時的洞見，不過很多時候也曝露出馬克思主義無力應付一個新的全球差異政治的窘境，華勒斯坦 (Immanuel Wallerstein) 曾坦白地指出這一個理論困境。本文將討論安德森 (Benedict Anderson)、蓋爾納 (Ernest Gellner) 和巴巴 (Homi Bhabha) 等民族主義和後殖民理論者，探詢一個新的全球差異和認同政治與國家權力消長間的關係。我發現這些理論提供不同的方式看待民



族、國家與全球經濟問題，不過某種程度仍陷於早期馬克思主義者的泥淖中。最後，我從殖民理論者法農（Franz Fanon）的文字裡，發現重建一個嶄新的民族理論的契機。

一 “民族問題”：盧森堡與列寧

對馬克思(Karl Marx)或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來說，資本主義以其市場導向的生產方式，終究將消弭所有民族的界線，並創造出一個統一的全球生產模式。在〈共產黨宣言〉裡，馬克思與恩格斯宣稱“民族間的差異與對立日益消失中，起因於布爾喬亞階級的進展、商業自由、世界市場、以及生產模式和相應的生活條件的一致化”。在討論英國在印度的殖民時，馬克思更指出殖民主義的兩個任務：“第一是破壞，再來則是重建，破壞古老的亞洲社會，然後建立一個以西方物質條件為基礎的社會。”³ 民族差異的問題從不曾在馬克思的理論中佔據重要地位，雖然民族國家的出現對布爾喬亞革命有其重要性，不過終將在無產階級的運動中跟隨資本主義走入歷史。換句話說，民族差異只是暫時的，最後將消失於國際主義的普遍性中，一個無階級（且無國家）的社會將出現。

在這個普遍主義的假設下，資本主義扮演重要的媒介角色，以促成一個單一生產模式的建立，並造成一個世界性的對立。雖然馬克思意在推翻資本主義及其相應的自由主義意識形態，但馬克思的進化論思想，卻使得他無異於其他同時代的思想家，視而不見民族差異在資本主義擴張中的角色。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早晚會取代其它社會形式，然後一個基於單一生產模式的世界體系將從廢墟中出現，鋪好通往社會主義革命的道路。



盧森堡與列寧就有關民族差異的政治過程的辯論，因此代表馬克思主義在這一個理論陣線上的失敗所帶來的焦慮。⁴ 馬克思對民族文化與差異的天真想法，反映在他從來沒有真正提出過一套理論來解釋為何資本主義一定得擴張，超越它本來的界線，以求得系統的持續。雖然在一些地方他談到市場與勞動力的問題，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擴張比較是一個歷史事實，而不是一個理論上的邏輯必然結果。⁵ 這造成在馬克思的作品中，很少處理到底民族主義與民族意識在全球資本主義結構中佔有甚麼樣的位置。

正是這個理論的漏洞，引起盧森堡、列寧與其他第二國際的許多理論家對民族自決權利的激辯。考慮當時正發生於波蘭與俄國複雜的“民族問題”，這些理論者思索資本主義的未來，以及一個馬克思主義者應有的立場與應採取的策略。例如在《資本的積累》(*Th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 這本書中，盧森堡就這麼說：

資本主義是第一個擁有宣傳武器的經濟模式，常試圖加深全球的差距並且排除其他的經濟型態，不容許任何敵人的存在。不過它也是第一個無法獨自存在的經濟模式，需要其他的經濟體系當作仲介與土壤。雖然資本主義掙扎著要變成普遍的，不過因為這個企圖，它卻終將崩潰——因為本質上資本主義無法成為一個普遍的生產形式。⁶

盧森堡在這裡試圖理論化內在於資本主義的矛盾，他認為資本主義絕無法成為一個自給自足的體系，也正是因為這個無法避免的矛盾，資本主義天生就得一再往外擴張，吸納其他的經濟體系，轉變它們變成單一的生產模式。不過這個世界體系終將崩潰，因為在擴張的過程中，矛盾只是被延遲了，並不是真的被解決。換句話說，雖然一再吸納其他體系，資本主義終將無法處理剩餘價值的實現的矛盾，當積累不再可能，資本主義的末日就不遠了。



這個觀點決定盧森堡在民族問題上的立場，民族自決的權利雖然有時在道德上是應支持的，不過為了保留一些非資本主義的生產型態，很多時候卻阻礙資本主義最後的崩潰以及世界無產階級的結合。這也是為甚麼盧森堡反對波蘭的獨立，因為波蘭持續經濟成長的未來，完全倚賴俄國帝國。⁷ 而且，這個為許多社會主義者倡導的所謂權利，很多只是布爾喬亞民族主義老掉牙的口號的反響，盧森堡說：“特別令人驚訝的是，民族自決這個藥方，其實和社會主義以及勞工階級的政治毫無關聯，民族自決權看起來只不過是布爾喬亞民族主義老掉牙的口號的重新包裝。”⁸ 對盧森堡來說，現代的民族觀念只不過是民族壓迫的藉口，很難稱為一個權利，至多只能從實際的歷史情況來加以判斷是否該支持一個民族獨立，這也是為甚麼波蘭獨立應加以反對，因為它會帶回來資本主義發展中落後的力量，如果不分青紅皂白地支持任何民族自決，這決非一個馬克思主義者所應為。

列寧基本上不同意盧森堡對民族問題的理解。反對盧森堡堅信資本主義歷史進展的經濟論，他強調資本主義發展與社會主義革命的政治面向。列寧認同資本主義發展的邏輯，不過拒絕接受民族問題在馬克思主義的計畫中只佔負面的地位，他強調民族自決權利的進步面向，以及可以促成民主的民族國家的能力，因此可以為社會主義作準備。在《有關民族問題的批判性論點》(*Critical Remarks on the National Question*) 裡，列寧說：“靠著將資本主義轉換成社會主義，無產階級創造了消除民族壓迫的可能性，不過這個可能性只有（記住，只有！）靠著在所有層面建立一個完全的民主才能成為事實，包括根據人民的意願來劃定國家的界線，包括完全的自由分離權利。”⁹ 對列寧來說，民族自決權應被視為一個進步的方式，以產生一個可以造就民主的民族國家的政治環境，最終消除民族壓迫。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因此有責任捍衛世界各地民族自決權利，因為這是惟一的方式促成資本主義的成熟發展，進而在時機到來時，以社會主義加以取代。



不過，在做這樣的宣稱的同時，列寧得面對幾個問題。對盧森堡來說，民族自決權只是子虛烏有的布爾喬亞創造，不只違反無產階級的利益，也阻礙資本主義的發展，盧森堡說民族概念假設“一個同質的社會政治實體”，而且“掩蓋了確實的歷史內容”¹⁰，對盧森堡來說，這一段被掩蓋的歷史內容——也就是資本與勞動的矛盾——正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論得處理的。事實上，列寧並沒有真正處理過為何民族自決權是馬克思主義計畫中一個不可缺少的要素，他批評顯現在俄羅斯化中的民族主義，認為其中所宣傳的民族文化不過是布爾喬亞的口號，以“麻痺工人的心智，愚弄並且分化他們”。¹¹在這邊，列寧的評論聽起來就像是盧森堡一樣，因此，到底為何列寧會宣稱只有透過人民同意的民族自決，才有可能消除民族壓迫與促成社會主義革命呢？為了反對盧森堡的指控，列寧因此必須指出民族自決在社會主義鬥爭中的必要性，同時，更重要地，到底甚麼是“民族”。

在這樣的要求下，列寧一個策略即是試圖區分布爾喬亞反動的民族主義與進步民族解放間的差異。列寧認為民族原理是布爾喬亞社會中的一個歷史必然，馬克思主義者完全承認民族運動的歷史合法性。“但為了避免變成是(布爾喬亞)民族主義的藉口，必須嚴格限定甚麼才是這些運動的進步性，所以這個承認才不會落入布爾喬亞意識形態，模糊了無產階級的意識。”¹²換句話說，民族自決權僅能夠適用那些經過人民同意，試圖擺脫外來統治，建立合法與進步民族國家的情況。¹³同時，透過這些方式建立起來的民族國家，構成世界無產階級聯盟的一個先決條件，因為資本主義在一個沒有民族壓迫的情況能夠進展更快，因而可以創造一個社會主義革命的有利情況，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因此應該無條件支持民族自決的權利。不過，到底如何定義民族呢？這是列寧的文章中一直沒有處理的問題。



帝國主義與不均衡發展：列寧與史達林

雖然列寧有時還是陷於馬克思的普遍主義中，不過我認為他觸及世界資本主義發展中的不均衡問題，以及民族定義的重要。不像盧森堡相信某種千禧年主義，認為革命終將因資本主義展的矛盾而自動到來，列寧則倡議一個較謹慎的方式來介入資本主義發展。他和盧森堡同時相信一個馬克思主義者應該注意現存的可能反動力量，並試著消除這些革命障礙，不過針對民自決所牽涉到的世界資本主義問題，列寧的診斷和藥方卻很不

從兩本書可大概看出一些端倪。一是列寧有名的小書《帝國主義：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Imperialism: The Highest Stage of Capitalism*)，提供我們瞭解，列寧如何看待上個世紀初以帝國主義式出現的全球資本主義。¹⁴ 關於這個新局勢，列寧提到工業的大成長以及生產集中於大企業的快速過程，構成資本主義最重要的特徵，因而“資本主義已轉變成帝國主義”¹⁵。列寧強調一個形式的資本主義發展，亦即帝國主義，透過“生產集中、壟斷、銀行與工業的合併與合作”，開始席捲整個世界。根據列寧預測，這個不均衡發展結構雖然起於一個寄生與衰敗中的資本主義，“不過假如我們相信這個衰敗的趨勢會排除資本主義快速衰敗的可能性，那我們就錯了。這不會發生，在帝國主義時代，某些部門的工業，某些階層的布爾喬亞階級，某些國家，或多或少會違反這一個趨勢，因此整體來看，資本主義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成長。不過這個成長不只會愈來愈不均衡，同時這個不均衡也特別顯現在那些擁有資本的富有國家的衰敗中。”¹⁶ 不像盧森堡的經濟論只預測一個單一生產模式的到來，列寧蠻有說服性地指出存於帝國主義經濟、政治與社會宰制中的不均衡結構。對列



寧來說，帝國主義作為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加深了資本主義的矛盾，不過也暫時支撐了整個體系不至於崩潰。

列寧指出這一個結構的不均衡狀態，這同時也說明他為何強調民族自決的權利。對列寧來說，帝國主義代表資本主義最高，但同時也是最後一個階段，強加於這些殖民地的政治宰制與經濟剝削，延遲了資本主義的最後崩潰。因此支持民族自決權乃有鉅大的政治影響力，以民主化獨立的民族國家，挑戰帝國主義的宰制，因而塑造世界無產階級聯盟的環境。這也是為何列寧在他的《有關民族問題的批判性論點》裡表明，馬克思主義下的民族自決代表“從一個歷史經濟的觀點，政治自決，國家獨立，和民族國家的建立。”¹⁷ 這是斬斷資本主義生命線的惟一方式。

史達林的《馬克思主義與民族問題》(*Marxism and the National Question*) 是我們得注意的第二本書，¹⁸ 進一步從理論和實際處理民族問題，也就是我們先前所問的——到底如何定義民族？這個問題緊緊扣住民族自決權利在理論和實際應用上的罩門，在列寧的要求下，史達林希望以這本書探討一個較完整的民族的定義，因此可以釐清民族自決權利的應用條件。史達林終究提出一個看似完整的民族定義：“一個民族是歷史建構，穩定的人類社群，建基於相同語言、領土、經濟生活以及相同文化下顯現的心理構成”，¹⁹ 幾乎完全按照先前的理論家像第二國際的考斯基 (Karl Kautsky)、波爾 (Otto Bauer) 和梅登 (Medem) 所提出的。²⁰ 史達林可能萬萬沒有想到，這個看似完成列寧在民族問題上的立場的定義，事實上為後來的民族主義理論者帶來更大的模糊與問題，安德森，蓋爾納以及哈布斯邦這些在二十世紀結束前二十年寫作民族主義的學者，很大程度在回應這個定義。例如哈布斯邦就曾說到“老馬克思主義者稱作民族問題的現象，要放在政治、技術與社會轉變的過程來看……民族及其它相關現象必須根據政治、技術、行政、經濟與其它的條件和需要來分析。”²¹



三 資本主義、世界體系與民族國家

列寧有關民族問題的想法引起兩個不同但相關的問題：(1)新興獨立的民族國家如何介入金融資本的流動，最終可以撼動甚至摧毀整個世界體系？這個有關資本主義未來的問題持續困擾列寧和一些後來的學者。(2)到底，民族的意義是甚麼？史達林的定義足夠處理遍地而起的民族主義嗎？馬克思的國際主義思想如何和這些興起的民族意識並存，甚至共榮？社會主義到來時，民族文化、民族意識或民族界線會消失嗎？或只轉化成甚麼？

雖然列寧提供許多研究民族國家與全球資本主義發展之間的關係的洞見，不過它的歷史主義（例如，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仍然阻礙了他具體地去瞭解民族解放運動中，反抗與宰制的細微政治過程。後來的學者像福朗克(Andre Gunder Frank)、阿敏(Samir Amin)和華勒斯坦在列寧的基礎上，試圖藉著反省資本主義的歷史，以克服這些理論問題。例如在思索過資本主義發展歷史的一些證據後，福朗克提出了當時頗令人驚訝的“低度發展的發展”理論：“過去幾世紀資本主義體系的拓展，已經有效且全面地穿透那些顯然是最孤立存在的一些低度發展世界的部分……和國際上發展與低度發展的關係類比，如今那些所謂低度發展國家的落後或封建地區的低度發展機制，和那些據說是較進步地區的資本主義機制一樣，都是相同的資本主義發展歷史過程下的產物。”²² 實際上，列寧甚至馬克思都已指出資本主義漫長歷史中存在的掠奪與破壞本質，不過福朗克的觀點特殊的是，他摒棄以生產模式定義資本主義，反過來企圖以一個擴張的歷史來看一個資本主義的形成。

在福朗克之前，資本主義的擴展被認為只有在某些發展階段，才具有理論上的重要性，例如列寧的帝國主義，或是馬克思筆下的原始積累，描述資本主義如何從強盜與偷竊開始，因而啟



動資本主義積累：“原始積累在政治經濟學扮演的角色，大概和原罪在神學上扮演的角色一樣。”²³ 福朗克則認為資本主義一開始就以不均衡的結構出現，發展與低度發展只是這個結構的一體兩面，他假設了一個中心國-衛星國學說，描述“一個中心-衛星組成的鎖鏈”，從“歐洲與美國等中心國一直到最遙遠的拉丁美洲鄉間的邊境小集”²⁴，這個認識對我們瞭解資本主義與民族問題有密切關係，也影響福朗克對民族解放運動的看法。表面來看，福朗克和列寧似乎都同意民族解放在斬斷這個代表中心國對邊陲宰制的鎖鏈，不過目標卻非常不同。不像列寧的歷史主義，相信民族解放在創造資本主義發展的有利情況，真正的社會主義革命應發生在未來一個完全資本主義化的世界，福朗克則認為民族解放應強調一個立即的社會革命，試著打倒邊陲國的布爾喬亞階級以推翻世界資本主義體系。

為了要更清楚說明這個差別，我還要在這邊強調福朗克和列寧對資本主義歷史的不同看法。福朗克認為資本主義從一開始就是一個世界體系，因此民族問題決非只是布爾喬亞民族主義，以及民族布爾喬亞階級和無產階級在反帝國主義戰線上的暫時合作。從建立之初，在中心-邊陲關係下形成的不平等結構下，資本主義體系就將它們分裂為兩個對立的團體。列寧認為在民族自決後，建立在這個聯盟基礎下的某種政治經濟獨立，只不過是沒有任何歷史證據的想像。不過，福朗克也不像盧森堡永不妥協的立場，將希望寄託在最後的國際主義革命，民族解放即使不是阻礙，也僅佔邊緣地位。相反地，福朗克認為革命僅能從邊緣開始，在民族解放形式下以無產階級為領導。

阿敏曾進一步說明這個複雜的情況：“只要我們還是堅持在資本主義生產模式下討論，事情其實很簡單。不過，資本主義已經變成是一個世界體系，不只是‘民族資本主義’並列在一起而已。”²⁵ 在某些段落，列寧幾乎抓住了社會主義革命與這個不均

衡的結構關係的真義，不過歷史主義與普遍主義仍妨礙了他更進一步探討一個馬克思主義者應如何在這個結構下促成革命。福朗克和阿敏的貢獻因此在於他們拒絕太過簡化地預測社會主義的未來：“一個完全社會主義的世界是甚麼，在世界合一的情況下，民族實體（假如它們能存活）如何連結起來，現在要來談論或甚至猜測都嫌太早了，回答這些問題很容易陷入烏托邦主義。”²⁶ 在一本談論社會主義未來的書中，阿敏說明他的立場：

這個新且特別的矛盾賦予後資本主義政權真正的性質，是馬克思的古典社會主義轉型的概念沒有預期的，一個民族的人民的建構，混合了衝突的社會主義的靈感 / 成就與為了生產力發展的需要的資本主義的靈感，……複雜的解釋包括社會文化的歷史決定，以及塑造了國家革命知識分子的社會主義運動（列寧主義、毛主義）在意識形態上的影響。不過，我真的相信，民族的人民的霸權可以運作的很不一樣，並且為政治民主與“市場”力量提供空間。²⁷

換句話，民族解放必須在民族的人民的霸權的情況下進行，而主導者也能看透瞭解資本主義作為一個世界體系的發展。不過誰是建構這個人民民族陣線的主導者呢（邊陲國的農民或中心國的無產階級，還是他們之間的某種連線）？這還是一個未解的問題。

雖然阿敏曾在他的另一本書試圖解答這個問題，不過卻只讓事情更加模糊。²⁸ 有些地方他認為勞動與農民階級會開啟革命，因為他們“很少將自己置於帝國主義與布爾喬亞意識形態的宰制底下”，不過他很快地在同一頁說“邊陲地方的社會主義革命成功後，很快引起一連串的問題。”²⁹ 也就是說，反帝國主義的民族解放很快成為一個反民主的民族主義政權，好像都不是列寧（完全民主）或阿敏（人民民族霸權）講的那麼回事。“到底甚麼是民族？”這個問題繼續困擾有關社會主義革命的分析。



阿敏基本上以中心-邊陲的矛盾，重塑馬克思主義中的對立 (antagonism) 問題，不過仍然忽略馬克思主義理論中無法處理不同方式人群聚集過程（民族概念只是其中之一）的問題，更不用說討論它們和階級分析的關係。雖然企圖訂定一個完整且具有規範性的定義，史達林的民族概念，仍然不足與太過簡化。華勒斯坦清楚地說出這個理論弱點：“超過一百年來，世界左派一直抱怨，世界勞工太常以人民 (people) 的方式組織他們，不過這不是一個可以解決的弔詭，這是因為體系的矛盾而來……試著瞭解到底民族是甚麼，不是會更有意義嗎？……我們絕無法從這個體系中去除民族，也絕不可能將之當成不重要的問題。”³⁰ 對華勒斯坦來說，當民族在這個體系佔據愈來愈重要的地位時，與其“為其特質而高興或者為其合法化現行體系的方式而感到被背叛”，一個馬克思主義者應該更清楚地分析“各種可能的方向，從中可以促使我們在這個不確定的轉變過程中，朝向不同可能的另類結果。”³¹

在〈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的階級衝突〉 (“Class Conflict in the Capitalist World-Economy”) 這篇文章，³² 華勒斯坦試圖更具體地探討這個不確定的過程，他澄清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兩極化結構，認為資產階級化（或相對的無產階級化）代表剩餘價值如何被重新分配的動態過程，在這個世界體系中的兩極化現象中，民族國家取得介入這個不平等交換中資本流向的能力：“這些不同國家在結構位置上的介入改變，的確影響——事實上在長期來看也轉變——世界體系。”³³ 換句話說，華勒斯坦試著指出資本流動的介入與民族或階級意識存在的關係：“[這些國家介入的過程] 是靠著影響世界無產階級的意識形成的介入變項來完成。”³⁴ 因此試著瞭解經濟（展現在資本流動）與文化（展現在民族意識的形成）的關係成為華勒斯坦的主要關懷，在〈文化作為當代世界體系的意識型態戰場〉 (“Culture as the Ideological Battleground of the Modern World-System”)，³⁵ 他指出文化的兩種用法（一是群

體區分自己和他群的方式；另一是文化作為一個群體內在不同團體間特質的區分），這個相互關係因此是建立在這個分別上的差異與認同政治，也正是那些蘊含於世界體系的矛盾，促成某些文化形式的建構，後來變成不同對立力量的意識型態戰場。

我認為華勒斯坦的觀點，幫助我們研究世界體系中民族文化或民族意識的影響，以及在不同脈絡間可能遇到的挑戰與轉變。華勒斯坦一方面假設一個存在於普遍性理想與特殊性躊躇之間的張力，另一方面也指出文化內在無窮的分歧。也正是這個張力，可以帶我們進入最近對民族主義的討論。

四 民族主義及其不滿

華勒斯坦在〈馬克思與歷史〉（“Marx and History”）一文裡談到：“只要他相信歷史無可避免將邁向進步，馬克思基本上接受普遍主義，一個線性的人類學。他所說的生產模式就像不同身高的學童，根據生產力的發展程度排成一條線。”³⁶ 對華勒斯坦來說，正是這樣子的觀點須要被質疑。列寧和盧森堡從來沒有真正去除這個問題，這因此使得他們在民族自決立場上的差異，比較像是實際運用過程中策略選擇的問題，而不是試圖去分析民族界線和資本全球化間的相互關係。福朗克和阿敏的理論雖然試圖從一個非目的論的立場重新思考全球資本主義，不過因為缺乏有關民族主義的歷史知識，因此顯得窒礙難行。

過去二十年對民族主義的討論，提供一些線索重新思考這個理論的困境。蓋爾納在《民族與民族主義》（*Nations and Nationalism*）這本書中告訴我們民族的建構性與民族主義的遍存性：“民族作為一個自然、上帝賜予的分類人群的方式，作為一個內在的雖然長久被延遲的政治命運，只是一個神話；民族主



義，有時將原存的文化轉換成民族，或有時發明民族，常常抹除原存的文化：這是一個事實，不管是好或壞，一般說來是一個無法逃避的事實。”³⁷ 安德森也同樣指出民族概念的新穎與想像性，印刷資本主義的出現使得這樣子的想像社群的建立可能：“資本主義與印刷科技的結合，在致命性的人類語言的分歧上，創造了一個新形式想像社群的可能性，在它的基本結構下，為現代民族設好舞臺。”³⁸ 換句話說，民族建造不再是任何內在特質的具體化，而是一個經由大眾媒體、教育體系、行政措施的一個認同形塑過程。³⁹

雖然受到一些批評，蓋爾納和安德森的理論在民族主義研究領域的確造成革命，安德森批評過往的研究：“不管是馬克思主義或自由主義理論，皆受制於像托勒密試圖‘拯救現象’的努力。”⁴⁰ 而一個可能的觀念革命的起點便是將民族、民族性或民族主義都看作是某種文化產品，雖然安德森的理論不見得完全新穎，⁴¹ 不過他基本上是第一個人，試圖從一個系統和歷史的觀點解答“到底甚麼使得民族想像可能”這一個難纏的問題。正是從安德森之後，我們才可能談論一個民族主義的象徵研究，民族成為一個具有時間共時性的文化產物，一個符號意義的象徵空間。

這一個理論革命一方面支持，另一方面則質疑歷來馬克思主義對民族問題的立場：一方面支持盧森堡強調的民族文化的建構性，不過也指出傳統馬克思主義將這個建構過程等同於虛幻的謬誤——因而忽略民族主義作為一個文化革命的細微與個人化的過程；⁴² 另一方面也支持列寧主義試圖尋找民族主義運動與馬克思主義革命共同基礎的努力，不過也同時指出史達林試圖找尋民族定義的無用。民族主義既非只是擺脫帝國主義的踏腳石（列寧），也不能被神秘化成一股無法表達的力量（阿敏）。從此以後，正是被馬克思主義理論邊緣化的民族主義需要被特別處理。

不過，蓋爾納和安德森的貢獻在某種程度上，仍然因為他們的某種歐洲中心主義而蒙上陰影。蓋爾納將民族主義界定成工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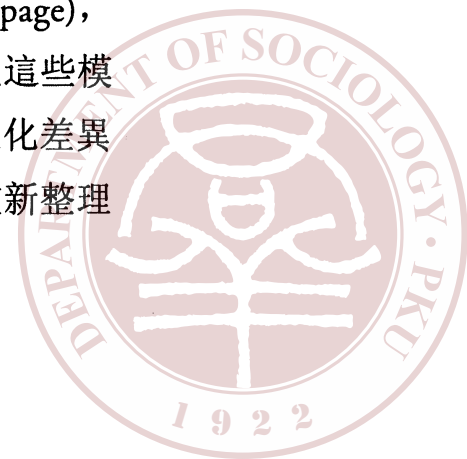


革命後上層文化形塑的結果，安德森搜尋民族概念在歐洲的文化根源，使得他們無力進一步探查不同形式、階段與歷史的民族主義表現，尤其像殖民地的民族主義。雖然蓋爾納和安德森成功掙脫本質論預設，不過某一部分仍陷在古典馬克思主意的困境中（亦即引用一個單一西方發展模式下的現代民族發展史）。安德森雖然較有戒心，希望區分民族主義成不同的模式——“現代民族主義則是這些近乎兩世紀歷史變遷的產物……這些遺產真的是多變的（Janus-headed）”⁴³，不過仍然無力進一步處理這個所謂多變的模糊情況。

印度學者洽特基（Partha Chatterjee）將這個問題歸咎於安德森的社會學決定論：

安德森對馬克思主義有關民族問題辯論的貢獻，即是強調民族的意識形態創造在民族主義運動研究裡應佔中心地位。為了這個強調，他指出現代語言社群創造的社會過程。不過，他並沒有追蹤存於這個過程中各式各樣，有時是矛盾的政治可能性，反過來以一種社會學決定論封閉了這個探詢。⁴⁴

對洽特基來說，正是這個決定論阻礙了安德森探詢那些政治可能性，其中不同的顛覆力量可能起而反抗民族主義、帝國主義或殖民主義的霸權。在另一個脈絡，巴巴也質疑安德森有關現代民族的想像只存在於一個同質的空洞時間：“安德森無法在他的自然化的、國家化的想像社群空間裡，處理隨意性符號的異化時間。”⁴⁵ 相對地，巴巴指出在民族想像中無窮的溜逸（slippage），以及民族敘事中的溢出（supplementary）過程，也正是在這些模糊的過程裡，民族文化與差異獲得它們的顛覆力量：“文化差異的目的是要從抗拒整體的少數力量的象徵位置的觀點，重新整理



知識的總合。”⁴⁶ 因此，這個巴巴所謂非目的性與非辨證性的差異位置，某種程度提供如何處理一個差異政治的模式，因而可以超越普遍主義（相同的愉悅）與本質主義（一個二元結構）。民族主義因此變成一個超象徵過程，其中符號概念的結合不斷遭受干擾與挑戰，民族想像也成為一個一直分裂、溜出的文化敘事。巴巴曾引法農說明這種模糊的後殖民情境，“法農的《黑皮膚，白面具》（*Black Skin, White Masks*）顯現出認同的雙重性：介於個人認同作為一個現實的暗示或存有的直覺，和認同的心理分析問題（主體探尋的問題）間的差別……從認同過程(identification)來看，認同並非預先決定，也不是一個完成的產品，只是試圖進入一個整體圖像的一個有問題的過程。”⁴⁷

五 結論：我們還需要一個民族理論嗎？

民族意識，而非民族主義，是惟一能帶給我們國際面向的東西……正是在民族意識的核心裡，國際意識得以生存與成長。這個雙重的出現最終是所有文化的根源。

Frantz Fanon, *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

三十年前，法農這句話點出一個嶄新的民族理論的可能。對他來說，民族意識（但不是民族主義）是創造力的來源：“民族不只是文化的條件、成果、持續更新與深化，也是一個必要條件。在民族生存之戰中，文化得以前進並且打開創造之門。”⁴⁸ 當然直接從這一段話不易得出一個具體可行的行動綱領，法農的書出版三十年後的今天，我們對所謂民族、民族主義、民族國家與民族文化的瞭解，使得我們站在一個比較有利的位置，可以探討一個文化與經濟的交叉空間中建構的聯盟可能。這篇文章當然不



可能處理一個完整的行動綱領，我想說的只是我們必須趕快形成一個理論架構，討論民族文化和國家脫鉤後，如何分別從全球與地方的脈絡討論一個新的民族概念——法農所謂國際主義和民族意識可以相遇的一個文化創造過程。

到底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如何看待民族與國家解除運動後的民族文化？法農的作品事實上指出了，一個在世界規模上容納文化與民族差異的國際主義理想。最近對全球化現象的討論，某種程度提供一個最新的資本主義情況來討論這個問題，超越後殖民批判限定在文學批評領域的限制以及對其逃避主義的批評。⁴⁹ 近十年的全球化理論探討第一次捲入如此廣大且深入的跨學科參與，不過令人遺憾的是，太多論述仍限於自由主義的天真（世界單一市場或世界政治經濟統合）或古典馬克思主義的泥淖（資本的同質化力量）中，亦即太簡單地斷定民族國家的死亡，⁵⁰ 以及民族文化的防衛性角色，無法看到在全球化過程中形塑的新國際主義理念、在地想像和民族文化，以及在這新三角關係中長出的世界反抗文化。薩伊（Edward Said）對民族主義與放逐的反省哀傷地指出理解這樣的辯證關係的必要：“民族主義強調對一個地方、民族與資產的歸屬，肯定語言、文化與風俗共同體建立的家園，如此因而避免放逐與它的負面效應。事實上，民族主義與放逐之間的關係就像黑格爾主僕的辯證關係，互相印證認知對方的兩個極端……民族主義是有關群體，相對地放逐則是有關外在於群體的個人經驗：在共同體中無法融入的感覺。我們如何超越放逐的孤寂，但也不落入大而無當的民族驕傲、集體情感與群體情緒的語言中？在放逐與民族主義血腥的宣稱的兩個極端中，那些東西是值得保存留住的？”⁵¹

對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來說，對民族概念的關注絕不能脫離建立一個可行的行動綱領的呼籲。在行動的可能性上，我認為一些歐洲學者提出的新社會運動（new social movements）理論，提供



這樣一組辯證關係的文化想像與實踐的基礎，雖然隱含的西方中心的歷史主義仍需要修正，而這個修正具有重要的意義。拉克勞和穆菲（Ernesto Laclau and Chantal Mouffe）曾指出了在複雜的社會中一個可能的社會主義策略。⁵² 我在另一篇文章裡也提到，⁵³ 杜瑞（Alain Touraine）則試圖以新社會運動的意義之戰取代勞工運動的革命理念，在歷史的特殊發展階段，不像勞工運動在攫取國家權力，新社會運動則尋求“增加整合不同鬥爭的機會”⁵⁴。杜瑞認為，“我們只能透過社會鬥爭和文化運動的整合，促使抗爭的整合，因為在後工業社會，統治者與反對運動行動的籌碼都是在掌握社會加於它的組成分子行為上的能力。”⁵⁵ 穆魯西（Melucci）也說：“在複雜社會裡，物質生產逐漸為符號與社會關係的生產所取代，系統的衝突環繞在群體與個人控制他們自己行動的能力。”⁵⁶ 換句話說，杜瑞和穆魯西在此提出社會抗爭的方法與目標，透過整合文化再生產過程中系統無法控制的細微反抗，新社會運動取得自我定義與自我管理的機會。不過艾斯可巴（Arturo Escobar）已指出在他們的理論中缺乏一個世界史與文化差異的考慮，他談到杜瑞的觀點時如此認為：

杜瑞認為拉丁美洲國家的集體動員並非真正的社會運動，只是試圖控制歷史變化與發展的鬥爭，在依賴、現代化與國家的現實下，其中國家控制所有生活的面向，社會行動者爭的不是歷史定義權（historicity），而是如何參與進入政治體系中。拉丁美洲爭將會逐漸進入更高的歷史階段，也就是透過工業化與發展，變成一個真正的現代國家。⁵⁷

新社會運動理論某種程度仍陷於現代性概念的泥淖中，使得我們很難去設想一個自我反省的第三世界社會運動，尋求去殖民化與另類的發展策略，遑論一個跨國的運動聯盟。艾斯可巴指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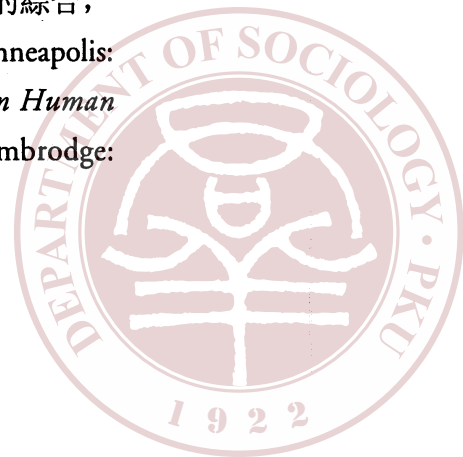


了蘊含於杜瑞“歷史層級”(levels of historicity)概念中的西方中心主義,認為“只有[西方]後工業社會達到歷史性需要的(和神、傳統、作為對象的世界的)分離。”⁵⁸ 艾斯可巴的修正指出了一個如何理解跨國社會運動的方向:民族、地方與全球相互印證支持的關係,應該成為新跨國社會運動的文化基礎。⁵⁹

考慮全球資本跨過國家直達地方的情況,一個不妥協且能抵禦資本力量的地方概念與跨域(包括跨地方與跨國)政治的建立,因此是當務之急,也就是在這裡,民族文化和地方想像成為相互定義(扶持)的概念(想想法農:民族不只是文化的條件、成果、持續更新與深化,也是一個必要條件);另一方面,正也是在這裡,民族文化和民族國家分道揚鑣,成為國際主義的一個重要不可分的成分(再想想法農:正是在民族意識的核心裡,國際意識得以生存與成長)。不過這並不表示民族國家的終結,而是一個精神分裂的開始,介於資本與勞動,跨國體制與本土/民族/世界聯盟之間的拉扯。

注釋

- 1 E. J. Hobsbawm,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Since 1780: Programme, Myth, Real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 2 Gregory Jusdanis 曾說:“文化以不同的程度蘊含於民族主義的各類計畫中……民族主義者運用有關文化的不同資源(詮釋、敘述、象徵、神話),還有文化體制(藝術、文學、學院),以及意識形態(同質認同的幻象),以促成民族的創造與維護”,參考Gregory Jusdanis, *The Necessary Na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 11。本文使用的民族意識代表在這樣子情境下的經驗狀態,包括感情連帶(參考Jusdanis, *The Necessary Nation*, 28–31)和理性的普同主義之間巧妙但帶有張力的綜合,參考Partha Chatterjee, *Nationalist Thought and the Colonial World*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6), 1–2和Tzvetan Todorov, *On Human Diversity: Nationalism, Racism, and Exoticism in French Thought*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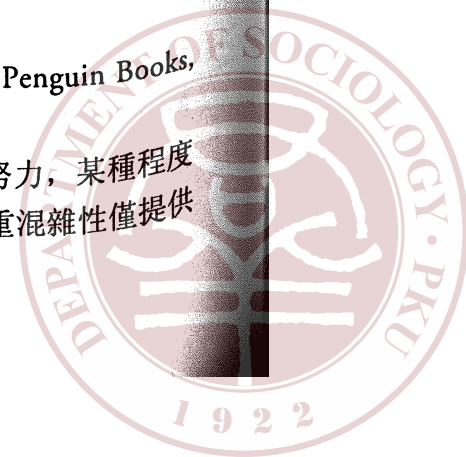
- 3 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 "Manifesto of the Communist Party," in *The Marx-Engels Reader*, ed. R. Tucker (New York: W.W. Norton & Company, 1978), 以及Karl Marx, "On Imperialism in India," in *The Marx-Engels Reader*, 659.
- 4 安德森曾引奈爾 (Tom Nairn) 的說法, 認為民族主義理論代表馬克思主義最大的歷史失敗, 參考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Verso, 1991), 3。奈爾試圖處理這個被他稱為現代多頭怪物 (modern Janus) 的民族主義現象, 參考Tom Nairn, *The Break-up of Britain* (London: MLB, 1977)。
- 5 參考Anthony Brewer, *Marxist Theories of Imperialism: A Critical Survey*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0), 44-51。
- 6 Rosa Luxemburg, *Th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51), 467。
- 7 參考Ronaldo Munck, *The Difficult Dialogue: Marxism and Nationalism* (London: Zed Books, 1986), 51, 以及Epharim Nimni, *Marxism and Nationalism: Theoretical Origins of a Political Crisis* (London: Pluto Press, 1991), 50-52。
- 8 Rosa Luxemburg, *The National Question: Selected Writings*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6), 102。
- 9 V. I. Lenin, *Critical Remarks on the National Question* (Moscow: Foreign Languages Publishing House, 1951), 116-117。
- 10 Luxemburg, *The National Question*, 135。
- 11 Lenin, *Critical Remarks on the National Question*, 13。
- 12 同上注, 22。
- 13 同上注, 41。
- 14 V. I. Lenin, *Imperialism: The Highest Stage of Capitalism*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39)。
- 15 同上注, 22。
- 16 同上注, 125。
- 17 Lenin, *Critical Remarks on the National Question*, 44。
- 18 J. V. Stalin, *Marxism and the National Question* (Moscow: Foreign Languages Publishing House, 1912)。
- 19 同上注, 16。
- 20 參考Ronaldo Munck, *The Difficult Dialogue: Marxism and Nationalism*, 77。考斯基在〈當代民族〉 ("The Modern Nationality") 一文裡提出古典的現代國家形式是民族國家, 雖然很少被完全實現, 語言則是形成民族國家的主要元素, 考斯基基本上還是堅持正統的馬克思主義說法, 參考John



- Kautsky, ed., *Political Change in Underdeveloped Countries: Nationalism and Communism* (New York: John Wiley and Sons, 1962)。奧地利馬克思主義代表人物波爾 (Otto Bauer) 則試圖提出一個社會主義的民族原理, 認為只有社會主義可以給全體人類享有民族文化, 即使社會主義來臨, 民族還是會繼續存在, 社會主義的國際分工將允許所有民族享有真正的政治自由與統一, 社會主義生產模式帶給人類的轉變導致民族共同體的組織, 國際分工必定造成民族共同體統一在一個更高的社會結構。所有的民族將因共同征服自然而統一在一起, 不過這個統一體將以民族共同體的方式組織, 所有的民族共同體可自主發展, 自由享有民族文化, 這就是社會主義的民族原理, 見Otto Bauer, “The Concept of the ‘Nation,’” in *Austro-Marxism*, ed. T. Bottomore and P. Good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8), 102–109。
- 21 Hobsbawm,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Since 1780*, 10.
 - 22 Andre Gunder Frank, “The Development of Under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 Underdevelopment of Revolution*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69), 5.
 - 23 Karl Marx, *Capital, vol. 1*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77), 873.
 - 24 Frank, “The Development of Underdevelopment”, 6.
 - 25 Samir Amin, *Accumulation on a World Scale: A Critique of the Theory of Underdevelopment*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4), 24.
 - 26 同上注, 33。
 - 27 Samir Amin, *The Future of Socialism* (Harare: South Africa Political Economy Series Trust, 1990), 16–17.
 - 28 Samir Amin, *Class and Nation Historically and in the Current Crisis*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80).
 - 29 同上注, 193。
 - 30 Immanuel Wallerstein, “The Construction of Peoplehood: Racism, Nationalism, Ethnicity,” in *Race, Nation, Class: Ambiguous Identity*, Etienne Balibar and Immanuel Wallerstein (London: Verso, 1991), 85.
 - 31 同上注, 85。
 - 32 Immanuel Wallerstein, “Class Conflict in the Capitalist World-Economy,” in *Race, Nation, Class: Ambiguous Identity*, Etienne Balibar and Immanuel Wallerstein (London: Verso, 1991), 115–124.
 - 33 同上注, 123。
 - 34 同上注。



- 35 Immanuel Wallerstein, "Culture as the Ideological Battlefield of the Modern World-System,"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7 (2/3)(1990), 31–56.
- 36 Immanuel Wallerstein, "Marx and History: Fruitful and Unfruitful Emphases," in *Race, Nation, Class: Ambiguous Identity*, Etienne Balibar and Immanuel Wallerstein (London: Verso, 1991), 126.
- 37 Ernest Gellner,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1983), 48–49.
- 38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46.
- 39 同上注, 204。
- 40 同上注。
- 41 安德森之前的許多理論家已提出相關看法。孔恩 (Hans Kohn) 認為民族主義是一個心靈狀態, 其歷史進程必須從集體心理的變遷來分析, 參考 Hans Kohn, *The Idea of Nationalism* (New York: Collier Books, 1967); 史耐德 (Louis Snyder) 引用孔恩的講法, 提出一個多面向模式: 具體的 (地理、語言、政治、社會、經濟與文化) 與觀念的 (心理), 參考 Louis Snyder, *The Meaning of Nationalism* (New Brunswick: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54); 杜區 (Karl Deutsch) 談論民族主義與社會傳播的關係, 大眾傳播體系的效率程度影響社會整合的程度, 參考 Karl Deutsch, *Nationalism and Social Communication* (Cambridge: MIT Press, 1953); 科德利 (Elie Kedourie) 認為民族主義假裝提供一個標準來決定可以擁有自己的政府的人口單位、可以合法使用權利的國家、以及規範國家間關係的正當組織, 民族主義理論認為人類自然被區分成民族, 許多特徵可以用來確定民族的存在, 惟一合法的政府是族自治的政府, 參考 Elie Kedourie, *Nationalism* (Oxford: Blackwell, 1993)。
- 42 科里根與塞爾 (Philip Corrigan and Derek Sayer) 在另一個脈絡裡談到民族主義作為一種文化革命, 參考 Philip Corrigan and Derek Sayer, *The Great Arch: English State Formation as Cultural Revolution* (Oxford: Blackwell, 1985)。
- 43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159.
- 44 Chatterjee, *Nationalist Thought and the Colonial World*, 21.
- 45 Homi Bhabha,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London: Routledge, 1994), 161.
- 46 同上注, 162。
- 47 同上注, 51。
- 48 Frantz Fanon, *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1967), 197.
- 49 巴巴試圖以多重混雜性 (hybridity) 質疑後殖民主體的努力, 某種程度亦解除了反抗的可能, 德立克 (Arif Dirlik) 批評: "多重混雜性僅提供



- 另類可能的衍生，但在現實生活中卻解消了另類可能；矛盾，認識到這樣的結果，要求參與，與特定目的干預”，參考Arif Dirlik, “Place-based Imagination: Globalism and the Politics of Place,” in *Places and Politics in an Age of Globalization*, ed. Roxann Prazniak and Arif Dirlik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2001), 28。
- 50 參考Kenichi Ohmae (大前研一), 《民族國家的終結》(台北: 立緒, 1996)。
- 51 Edward Said, *Reflections on Exile and Other Essay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176–177.
- 52 Ernesto Laclau and Chantal Mouffe,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London: Verso, 1985).
- 53 莊雅仲, 〈集體行動、社會福利與文化認同〉, 《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四十七期 (2002), 249–277。
- 54 Alain Touraine, *Return of the Actor: Social Theory in Postindustrial Society*.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8), 136.
- 55 同上注, 135。
- 56 Alberto Melucci, *Nomads of the Present: Social Movements and Individual Needs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89), 45.
- 57 Arturo Escobar, “Culture, Economics, and Politics in Latin American Social Movements Theory and Research,” in *The Making of Social Movements in Latin America: Identity, Strategy, and Democracy*, ed. Arturo Escobar and Sonia E. Alvarez (Boulder: Westview, 1992), 71–72.
- 58 同上注, 84。
- 59 這超越某些全球化論者常說的全球化與在地化的對應關係：所謂“全球思考，在地行動 (Think globally, act locally)”或“全球在地化”(glocalization)，已成為跨國公司穿透地方，謀取利潤的遁辭。

